

爱在长征中

潘宏 马宏伟 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

爱 在 长 征 中

潘 宏 马宏伟 著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中央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爱在长征中 / 潘宏, 马宏伟著.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6. 8

ISBN 7-5073-2162-2

I. 爱... II. ①潘... ②马... III. 党和国家领导人
—生平事迹—中国 IV. 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94351 号

爱在长征中

著 者/潘 宏 马宏伟

责任编辑/王春明

封面设计/慧 泉

版式设计/寇 炫

出版发行/中央文献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四北大街前毛家湾 1 号

邮 编/100017

经销热线/63097018

经 销/新华书店

排 版/北京地质印刷厂

印 刷/北京友谊印刷有限公司

680 × 960mm 16 开 23.25 印张 360 千字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5000 册

ISBN 7-5073-2162-2 定价: 45.00 元

本社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目 录

悲欢离合情难泯	
——毛泽东与贺子珍	(1)
高尚心灵的联盟	
——周恩来与邓颖超	(20)
身陷逆境砥中流	
——朱德与康克清	(40)
如歌岁月紧相随	
——任弼时与陈琼英	(61)
志同道合成知己	
——张闻天与刘英	(77)
播种幸福同路人	
——邓发与陈慧清	(99)
一件夹衣一世情	
——谢觉哉与王定国	(116)
恩爱伉俪显才情	
——李富春与蔡畅	(134)
蝇头小楷寄深情	
——刘伯承与汪荣华	(153)
情深意笃将星路	
——甘泗淇与李贞	(172)
北上坎坷不渝情	
——杨尚昆与李伯钊	(188)
同心城中结同心	
——傅连璋与陈真仁	(212)
历尽艰辛终相逢	
——毕占云与刘彩香	(234)



姐妹花与军团长	
——贺龙、萧克与蹇氏姐妹	(248)
英雄曲终人不见	
——陈昌浩与张琴秋	(268)
战歌搭桥结伉俪	
——洪学智与张文	(287)
岁月风雨化绝唱	
——王首道与王泉媛	(305)
仙女长风绕战旗	
——徐海东与周东屏	(328)
真爱犹在敢问天	
——罗明与谢小梅	(347)
主要参考书目	(363)
后记	(366)

悲欢离合情难泯

——毛泽东与贺子珍

毛泽东一生的几次婚姻，人们曾为杨开慧的英年早逝而扼腕，也为江青与毛泽东的结合而颇有遗憾。对于贺子珍，人们更多的是惋惜和同情。在毛泽东一生政治生涯最危难的时候，情感最需要抚慰的时候，贺子珍始终伴他左右。从1927年永新塘边村的井冈之恋到1937年贺子珍执拗出走苏联，整整10年的时间里，他们共同经历了对中国革命及毛泽东个人意义重大的遵义会议、中国革命最艰苦的长征岁月；他们孕育了6个共同的爱情结晶，也共同承担了弃女别子的痛苦。晚年，毛泽东始终是贺子珍生活中永远记挂甚或痴迷用情的人；而在毛泽东，1959年刻意安排的与贺子珍的庐山会面，让人费解的“一拍即合”的希冀，按着我们常人最简单的理解，不正是对10年夫妻情、战友情、温顾和难以释怀吗！

毛泽东一生有泪不轻弹。但是，在长征路上因贺子珍却有例外。

两人一生，真情难叙，真情难泯。

1. 鲜为人知的历史之谜：毛泽东与贺子珍何以踏上长征路

毛泽东亲自创建了中央红军和中央苏区，在党和红军以及苏区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但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领导者，以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自居，讥笑中国的“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污蔑毛泽东的正确观点和主张，千方百计地排斥毛泽东的领导地位。1931年11月初召开的赣南会议，根据六届四中全会的精神，提出了反对所谓右倾和“改造各级领导机关”的错误纲领。赣南会议是中共中央代表团在中央苏区加紧贯彻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



主义所采取的一个重要组织措施。继之，在1932年10月召开的宁都会议上，毛泽东提出的以防御及灵活的斗争策略应对敌人第四次反“围剿”的游击战略，受到系统批判与围攻。会后，中革军委发出通令：为了苏维埃工作的需要，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兼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同志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所遗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同志代理。毛泽东实际上被撤销了军事领导职务。这两次会议是敌强我弱形势下，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的进攻战略与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斗争的总爆发。斗争的结果是，毛泽东完全被排斥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之外。

1933年初，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无法立足，被迫迁入苏区，进而为“左”倾错误在中央苏区的贯彻创造了契机。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中，毛泽东多次从党和人民的大局出发，阐明自己的观点。但是，博古和李德等人拒绝采纳。广昌战役失败后，苏区北方门户洞开，关键时刻，博古、李德等人也没有忘记消除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影响，他们在给共产国际关于中国战事的报告中，仍然建议将毛泽东转送苏联“治病”。他们居心叵测的建议，得到毛泽东坚定回绝：“我不去，我不离开中国。”

关于长征前高级干部去留的决策问题，张闻天曾在1943年所写的《延安整风笔记》中作过如此回忆：

当时关于长征前一切准备工作，均由以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所主持的最高“三人团”决定，我只是依照最高“三人团”的通知行事，我记得他们规定了中央政府可能携带的干部数目字，我就提出了名单交他们批准。至于高级干部，则一律由最高“三人团”决定。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红军长征史》曾对这段历史有此评价：

当时的走与留……对他们个人以后的命运关系极大。事实证明，像董必武、徐特立等年高体弱的同志，由于跟着红军行动，都被保存下来，安全到达了陕北。而一些“左”倾领导者不喜欢的干部，像瞿秋白、何叔衡、贺昌、毛泽覃、古柏、周以栗等人，则被他们乘机甩掉留在根据地打游击。

关于毛泽东的去留问题，博古、李德等人最初在撤离苏区时，打算把毛泽东留在苏区搞“调查研究”，不让他参加长征。但是，他们慑于毛泽东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的职务以及他在苏区的威

望，又不好将毛泽东留下。周恩来则从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出发，坚持毛泽东应该随军长征，因为他既是中央红军的创始人，同时又具有娴熟的军事指挥才能，在战略转移中将会发挥重要作用，周恩来的建议对毛泽东能随中央红军长征起到了关键作用。另据红军史研究专家徐占权考证，最后同意毛泽东参加长征的人还有另外的考虑：如果把毛泽东等人留在中央苏区，那么中央苏区中央分局书记的职位就会受到挑战。他们认为毛泽东很有可能会在原来深厚的政治根基上，重新掌握苏区的党政军大权。因此，他们宁愿冒着风险，也要把毛泽东带上长征路，对他严加控制。对他们而言，空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头衔的毛泽东走在长征路上，相对更容易控制一些。可见，“左”倾领导者们对毛泽东是何等的处心积虑。

长征前夕的毛泽东，正值政治命运的低谷；但他的生活里却有贺子珍紧伴相随。



1933年，毛泽东在瑞金。

1934年10月的一天，毛泽东突然回到家里，神情十分严峻。

贺子珍一眼便看出了他异常的神情，赶忙问：出了什么事？

“我们的队伍要坚持不住了，要撤离苏区。”毛泽东沉重地说。



贺子珍的心头掠过一阵惊异。她想到了前方战事的危急，却万万没想到红军最终要撤出苏区。自己一直战斗在这一片苏区热土上，真的走了，以后这里会是什么样子呢，红军的家将在何处呢？她一时回不过神来。

毛泽东接着告诉贺子珍：“中央规定，红军这次转移，女同志一律不得跟着队伍走，孩子更不能带。”

毛泽东停了一下，很动情地说：“我怎么舍得把你们留下？”

贺子珍是位刚强而又组织纪律性很强的人，她什么时候都严格要求自己，从不因个人的事而影响毛泽东的工作。她相信毛泽东，遵从毛泽东的意见。但坚强的她还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流下了眼泪。可她生怕毛泽东为她分心，便尽量用平静的声音说：“这是不得已的事情，我要走不了，就带着小毛，到他奶妈家住一个时期，看看情况再说。”

“你走不走，还得听听我的意见呢！”毛泽东不容分说，激动地、几近一字一顿地说：“我们一定要回来的！我们绝不放弃苏区！”

这是毛泽东的风格和气派。言词间充满了对敌人的恨，对“左”倾错误者的不满和对苏区的深厚感情。

贺子珍知道，为了两人不致分离，毛泽东会不惜一搏。

几天后，毛泽东派警卫员来通知贺子珍：把他日常用的衣物交给警卫员带给他，他径直从于都随先头部队出发了。毛泽东还捎来话：中央已批准贺子珍随部队出发。



毛泽东与警卫人员在中央苏区

事后，贺子珍从警卫员那里知道，这次连她在内，中央一共只批准了30名女同志随红军队伍出发。这些女同志都经过严格的审批手续，要符合三个条件：政治条件好，有独立工作能力和能坚持长途行军。多数女同志经过了严格的体检，大部分被编在总卫生部休养连。

贺子珍怀着身孕，跟随毛泽东踏上了长征路。

毛泽东跟上长征队伍的缘由已十分复杂，贺子珍能踏上长征路更加不易。

毛泽东对贺子珍用情良苦。

这是惟一的解释。

2. 为革命弃女别子，患难相随长征路

井冈之恋，贺子珍对毛泽东因敬佩而生情，义无反顾地追随毛泽东。

那还是在毛泽东初上井冈山不久。

此前，贺子珍已随“落草”的袁文才的队伍驻扎在井冈山上。袁文才是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的同学兼好友。袁文才杀富济贫的侠胆豪气深深地影响着年轻幼稚的贺子珍，富于革命精神的贺子珍在永新暴动后，为了躲避湖南军阀的进剿，毅然跟着自卫军队伍上了井冈山，成为井冈山上第一位女战士。在井冈山上，袁文才和妻子对贺子珍关心备至。袁文才曾热情地向毛泽东介绍道：“她是永新的干部，叫贺子珍。”那一刻，毛泽东颇为惊讶，爽朗地笑着说：“我还以为她是你的女儿，或者是哪位同志的家属呢！”

他同贺子珍握手：“很好，很好，我们今后共同战斗吧！”

多少年后，贺子珍回忆起与毛泽东初次相识的一幕，还会凝神静气地神往当年。

在永新塘边村，贺子珍向毛泽东介绍了永新党组织及农会的许多情况，得到毛泽东的赞许。贺子珍读书不多，在毛泽东面前，她深感自己知识不足，对毛泽东敬佩有加。毛泽东坚强的革命意志以及认真细致的农村调查研究工作，令她难忘。毛泽东撰写的《永新调查》，贺子珍曾拜读过、誊抄过，数十年后，她还能清晰地回忆起其中的大部内容。在永新，他们曾遇到敌人的几次突袭。危机时刻，毛泽东指挥若定的大家风范，令这位刚强的女性难以忘怀。

贺子珍比毛泽东小16岁。但贺子珍深深感到，能够在毛泽东的身



边工作，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对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很有帮助。不知不觉中，贺子珍时常依门而立，深情注视工作中的毛泽东。在交谈中，贺子珍了解了毛泽东追求革命、献身革命的经过。那时的毛泽东已经34岁了，结过婚，妻子和3个孩子都留在湖南老家。他袒露心迹：同家人关山远隔，音讯渐阙，生死两不知。妻子杨开慧或传被捕或说被杀，真假难料。

永新塘边村，毛泽东与贺子珍在相知相敬中相爱相伴。

他们走到了一起，没有任何仪式。

1929年四五月间，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正处于初创的红火时期，贺子珍分娩了，这是贺子珍与毛泽东两人的第一个孩子。在部队即将出发前，贺子珍征得毛泽东的同意后，将孩子送人。19岁的贺子珍实在太年轻了。她认为自己转战赣南与闽西，见到女儿并不是件难事。但是，3年后，两人再回龙岩，得知女儿与他们永远地阴阳两隔了。这是他们两人为革命失去的第一个孩子。

宁都会议前，即1932年九十月间，贺子珍在福建长汀的福音医院生下一个男孩。奶妈怜爱地按着江西人习惯将新生儿唤为“毛毛”。小毛的出生给正在遭受“左”倾错误迫害的毛泽东带来了极大的安慰和乐趣。

生活中的毛泽东是个非常重情义的人。

贺子珍产后染病，身体非常虚弱。毛泽东得知后特意提了一罐鸡汤给贺子珍。那年月，这实在是难得的产后补品。她知道，毛泽东为此几乎把几个月的津贴都用上了。

“我有钱，组织上发了我零用钱，还有休养费。”毛泽东宽慰着贺子珍。

“这些钱是组织上照顾你身体的，你身体不好，留着自己吃吧！”贺子珍望着受疟疾煎熬的毛泽东，心疼地说。

“我也有呢！”毛泽东回答说，“一共买了两只，我留下一只了。”毛泽东说着，转身抱起了小毛。

贺子珍知道毛泽东在哄她。在政治迫害接踵而至的日子里，毛泽东几乎被孤立起来。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毛泽覃和贺子珍的家人，都受到程度不同的牵连。但越是在这样的时刻，贺子珍却更加理解毛泽东内心的苦闷，更加关心毛泽东的健康和生活。

毛泽东非常喜欢小毛，常常对小毛又亲又抱。望着幸福的父子俩，贺子珍的心里充满了母爱。她也爱这个孩子，她常想，要是这个孩子能

生活在自己的身边该有多好哇！连年的征战生活，贺子珍和毛泽东很少享受到天伦之乐。小毛在他们的身边长大，日久生情，是他们最喜爱的一个。

可长征又使他们面临生离死别，为毛泽东与贺子珍两人留下了切肤之痛。

《毛泽东之路》一书曾对此有如下描述：

1934年重阳节，贺子珍在瑞金沙洲坝请她父母做了团圆酒菜，但迟迟没人入席——当时毛泽东正染疟疾，在几十里外的于都独自苦痛；毛泽民和钱希钧匆匆赶来，告别后又匆匆离去——虽然毛泽东当时正在遭到批判，而毛泽民却掌握苏区财经大权，是须臾不可离的人才，因此可以参加长征（此时对贺子珍能否随军，都还没有定论）。在酒席上说起小毛毛，贺子珍坚持带儿子走，但经不住众人的劝说，只好答应把他托付给受毛泽东牵连、留在苏区指挥战斗的弟弟毛泽覃、贺怡夫妇。等到毛泽东病愈赶回，不见儿子，只见到眼泪汪汪的贺子珍。得知原委后的毛泽东不禁大发雷霆：你也太狠心！等我回来，再看一眼抱走不行么？你们真蠢……

当年为毛泽东站过岗，跟贺子珍学过文化的一名红军小战士，晚年曾透露了毛泽东失子后的情景：那夜，主席房里没有灯光。第二天清早，我看见桌上有两张毛边纸，湿湿的，像是泪水泡过。其中一张写着：英（狗）、青（猪）、龙（兔）、红（猴）。岸英、岸青、岸龙、岸红，毛泽东先后有过4个儿子，却一个也不能留住他们，他的爱子毛岸红更是连照片都没有一幅，如今音讯全无，惟有默念生肖属相。后来，更让毛泽东伤心的是，毛泽覃遗孀、贺子珍的胞妹贺怡为寻找小毛也付出了生命代价。

在长征途中，贺子珍又生了一个孩子。一天晚上，当部队到达贵州的一个山沟里，已经是9点钟了。天漆黑漆黑没有一丝星



英姿飒爽的贺子珍



光，还下着小雨。这一天为了避免与衔尾追来的敌人遭遇，部队便以急行军的速度飞速前进，一天走了80多里路，大家都疲乏极了。贺子珍因劳累忽然感觉肚子阵痛频频，当晚便生下一个女孩。警卫员吴吉清用脸盆把孩子洗净，这个脸盆平时用来洗脸、洗脚、打饭装菜，现在又多了一项新用途。据说当第二天用它来打饭时，盆沿上还有鲜红的血迹。没过几个小时，部队又要出发了。思忖再三，贺子珍把钱希钧和吴吉清叫来，声泪俱下地吩咐道：“孩子不能带，你们想办法把她寄养在老百姓家里吧！战争是残酷的，不能怪我们不喜欢后代，实在是没有办法。让孩子在人民当中长大也好，她大了如果是革命的，会来找我们的！”



贺子珍（后排右一）
与战友在一起

想着自己10月孕育为这个孩子付出了健康的代价，可却又要被迫抛弃，贺子珍话不成言，泣不成声。

董必武和休养连连长侯政向钱希钧和吴吉清作了一些交待，接着他取出纸笔，写下几个字：

本户主人鉴：

我们是为千人服务的工农红军，今在苗家借地生子，实在出于万不得已，望千万不要听信土豪劣绅的欺骗。因军情紧

急，此子无人携带，深望老乡将她扶养成人，不胜感激。今留下大洋30元、烟土两块，仅表微意而已。

红军休养连 董必武留

董必武把纸条连同钱和烟土交给两人，他们抱着熟睡的孩子找人家去了。当地老百姓不了解红军，都跑上山躲藏起来，他们在山沟里找了好长时间，才在山坡上发现一点昏黄的灯光。他们敲门进去，但屋里只有一位瞎婆婆。钱希钧委婉地说明来意，但老婆婆为难地述说着日子的艰难。苦命的孩子被留在山沟里了，命运可想而知。

45年之后，当侯政到医院里去看望贺子珍时，贺子珍提起这个连面目都记不清晰的婴儿，心里泛起的苦楚难以言表。毛泽东、贺子珍夫妇为了中国革命共失去了5个子女。

3. 真心关爱，生死考验铸就战友情

贺子珍是毛泽东政治上的坚定支持者和精神上的安慰者。长征初期，在王明“左”倾路线给毛泽东罗织罪名时，贺子珍积极支持毛泽东要与“左”倾错误者据理力争，在众人纷纷回避毛泽东时，贺子珍却更加体贴毛泽东。

长征中毛泽东指挥部队走在前面，贺子珍被编在休养连走在队伍中间，两人不经常见面，偶尔碰到一起，贺子珍便抓紧时间给毛泽东缝补衣服，抄写文件，同时，细心地关注着毛泽东的政治命运。

一天，贺子珍随着部队来到连绵不断的越城岭，其中的老山界是一段极为难行的险峻山路。一尺宽的“通天路”，大家叠罗汉似的前行，她带着8个月的身孕，实在苦不堪言。终于熬到了宿营地。贺子珍打着火把，同董必武一起，来到了一个山神庙里。见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正在庙堂休息、交谈。

毛泽东亲切地与董必武打招呼：“董老，难为你们几个老人了。路难走啊！”

董必武答道：“不行，过湘江的时候，我们的心情好像都掉到江里去了。唉！一万战士同日死，石头人也会动心啊！其中因由，不可不察。”

董必武的话好像拨动了毛泽东的敏感神经，他坚定地回复道：“是的，一定要讨论失败的原因。”

王稼祥接过话茬：“是到了讨论的时候了。”

张闻天不住地点头附和：“对呀！不可不察！”

当天晚上，贺子珍留宿在小庙里。她同毛泽东讲起了过湘江时自己见到的一幕：湘江两岸成了用红军战士的尸体垒成的长城；湘江水已被鲜血染红；远望下游的水湾里，浮起的红军尸体一色灰军装，密密麻麻，江水为之不流。每念及此，贺子珍浑身就会感到透骨彻寒。

望着伏案不语的毛泽东，贺子珍打住了话。两人的心情同时沉重到极点，房间的空气似乎都凝固了。

毛泽东过了好一会，才把视线缓缓移开，对贺子珍说：“你抄吧！我还要想想下一步的走法！”

贺子珍提笔抄写，不时地对毛泽东潦草的字迹发问：“这是‘口袋’两个字吗？”

“对！如今蒋介石的飞机天天在头上飞，我们想去湘西与贺龙、萧克会合的计划，他早已察明。他已布好了‘口袋’，等我们去钻呢！我们不能再往他的口袋里钻了，我们要向贵州前进，那里敌人的兵力弱，不然，湘江的悲剧就会重演！”

贺子珍非常遵守组织纪律，不该问的她不多问。她仔细地把文件抄好交给毛泽东。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每到一地，贺子珍都急切地问身边人：我们要往哪里走？部队在山中穿行，贺子珍往往不辨东西，但她却十分关心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是否被采纳。

红军来到了湖南道县，这是一个三岔路口，位于桂、黔、湘交界，是个鸡鸣三省之地。红军必须做出决定命运的选择。

当夜，贺子珍随毛泽东住在一个像是教堂的学校里。晚上，傅连璋到毛泽东处巡诊，罗明正好也来拜访。但毛泽东打完针，却没有与这位“罗明路线”的代表寒暄，他示意房间有人：“我正同洛甫（张闻天）、王稼祥同志说事，你在这里等一下，先同子珍聊聊。”

不一会，从隔壁传出了毛泽东情绪激动的谈话：“湘江一战，我们已经损失了三万多人马。从出发时的八万六千人到现在只剩三万人，我们应该好好想一下是什么原因。我们不应再按着原计划到湘西与贺龙、萧克会合了。那样就会中计，进入蒋介石布下的‘口袋’。我们要向敌人虚弱的贵州前进……”

“我们是不能再犹豫了……”贺子珍听出是王稼祥的声音。接着是一阵小声的议论。

贺子珍已经从张闻天、王稼祥二人耐心地同毛泽东商谈红军大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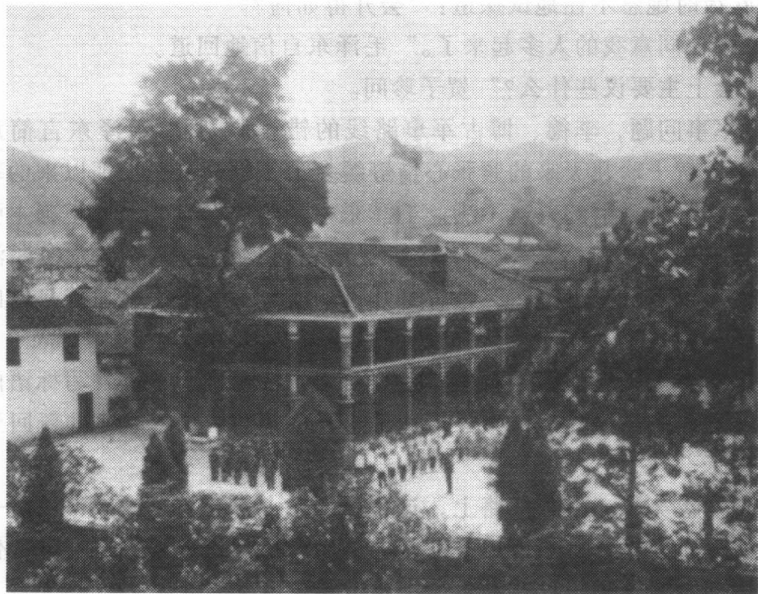
事态中，得出一个结论：毛泽东已经不再孤立了，虽然他仍然处于劣势。

房间外的谈话不知不觉也停了下来。傅连璋同罗明同时感到毛泽东等人的议事非同小可。傅连璋借故急着巡诊走了，罗明也打住了话抽身离去。

贺子珍拿出毛泽东的破旧衣服缝补起来，可却多次扎手，她心里不断地喃喃道：毛泽东的想法和计划总算在党和红军的高层里产生了共鸣。

三天后，行军的队伍拐了一个大弯，大家明显地感到了行军路线的变化。贺子珍跑到了休养连最前头，忙问侯政：“我们这是往哪走啊？”“往贵州。”侯政的话很简单，但贺子珍的心情却格外的高兴。只有她知道，这意味着毛泽东的主张不但得到承认，而且开始得到贯彻。

山路弯弯，经过轻装的红军队伍行军速度明显加快。不久来到了陡壁高耸的乌江，下崖十里，在拍岸的波涛声中渡过湍急的乌江，又爬上十里高的崖壁，向遵义挺进。



遵义会议旧址

1935年1月上旬，红军攻占贵州的遵义城。

毛泽东更加忙碌了。他整天不在家，也很少睡觉，晚睡晚起的习惯



也改了。贺子珍很理解毛泽东，知道他正忙着军机大事，于是利用长征路中这难得的休整时间，帮毛泽东打理零乱的什物。

遵义是一个比较繁华的中等城市，市面热闹。一天，贺子珍上街买了一些鲜鱼，她知道毛泽东最喜爱吃鱼，便想着为他改善一下伙食，这几天他实在太忙太累了。

辣椒烧鱼做好了，可毛泽东却迟迟不归，直等到贺子珍趴在桌上睡着了。

“好饭菜哟！”毛泽东大声的赞叹声惊醒了贺子珍，她也不知是夜里几点了。

“怎么这时候才回来？吃饭了吗？”贺子珍不无埋怨地问。

“还没吃，顾不上呀！现在实在饿了。”说着，毛泽东下箸如飞。

“这么晚还忙什么？”贺子珍不解地问。

“找人谈话嘛！明天就要开会了，得抓紧时间做工作。”

遵义会议召开的那几天，贺子珍感觉到会上会下气氛都很紧张。贺子珍急切地想知道会议的结果，可又不敢乱问，出于对毛泽东的关心，一起吃饭时她忍不住地试探道：“会开得如何？”

“现在同意我的人多起来了。”毛泽东自信地回道。

“会上主要议些什么？”贺子珍问。

“军事问题，李德、博古军事路线的错误。”听着毛泽东言简意赅的谈话，贺子珍几天来的紧张心情舒缓多了。她知道，长征以来的军事失利在红军中已引起普遍不满。毛泽东主张改变军事路线的正确主张是最容易被理解和接受的。贺子珍清楚地记得，就连博古本人在湘江岸边，面对数万将士的阵亡，精神都几近崩溃，不时用手枪对着自己的脑袋比画。她从毛泽东的谈话中预感到：转折就要来临了。

果然，一天中午会还没散，一个女同志快步走向了正在写标语的机关同志们，兴高采烈地向大家传达了这样的消息：“毛主席重新回到领导岗位了。”

贺子珍笑了。在长征路上，这是贺子珍从未有过的最开心的一天。她学过译电发报，她热情地帮助译电员们亲手把这个喜讯通过电波传到了一方面军各军团。这在她生命中永远难忘。

“错误的军事路线终于结束了。我也有了发言权了。”遵义会议结束的当天，毛泽东回到家里，激动地对贺子珍说。

“是啊，现在好了！我们又有希望了！”毛泽东和贺子珍紧紧相拥在一起。那一刻，只有他们两人能体会到彼此之间休戚与共的真爱。